

呂
思
勉
文
集

呂
思
勉
論
學
業
稿

呂思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通志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呂
思
勉
文
集

呂思勉論學叢稿

呂思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呂思勉論學叢稿/呂思勉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呂思勉文集)

ISBN 7-5325-4512-1

I. 呂... II. 呂... III. 國學-文集
IV. Z12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94283號

呂思勉文集

呂思勉論學叢稿

呂思勉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經銷處: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印刷四廠有限公司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24 插頁 4 字數 624,000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

ISBN 7-5325-4512-1

K·920 定價:55.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前 言

呂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呂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呂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閱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呂先生夙抱大同思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彌篤。

呂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並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並入華東師範大學，呂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

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呂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呂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呂著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〇年、下冊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史》（一九四七年）、《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呂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九八五年）、《呂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編三部：《呂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呂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呂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錄，可惜未能完稿，是為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呂思勉論學叢稿》收輯各類文章共一〇二篇，大體分為“史學”、“哲學”、“社會經濟文化”、“文學文獻文字”和“書信序跋自述”等五組，內部又按寫作和發表年代的先後加以編排。

“史學”和“哲學”二組收錄的是呂先生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五〇年間的部分學術文章，其中《古史紀年考》、《蒙古種族考》、《秦漢移民論》、《漢人皆產雜論》、《道家起原雜考》等，都是呂先生早年的重要論文，曾刊於《大中華》、《齊魯學報》等學刊及《古史辨》第七冊中。《辯

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的《東方雜誌》，反駁當時梁啟超主張陰陽五行起於戰國時代燕齊方士而由鄒衍首先傳播的說法，認為梁氏此說“頗傷武斷”，而“其誤在於信經而疑傳”。《中國文化東南早於西北說》、《古代人性論十家五派》、《西漢哲學思想》、《魏晉玄談》等篇，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呂先生在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的教學講稿。《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係》和《古代印度與佛教》最初都發表在二十年代初期的《瀋陽高師周刊》上，也是因教學的需要而撰寫。《古代印度與佛教》是先生少數幾篇專門論述外國史的文章，文中對人種分布、民族遷移、東西方交通往還、印度宗教的興衰和傳播等敘述，頗為簡明而扼要，對瞭解古代中印之間和東西方關係，很有參考價值。

“社會經濟文化”一組收輯的時論性文章共三十篇，內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呂先生是一位純正的學者，不參與實際的政治活動，但對社會變遷、民衆生計等現實問題極為關心，其立言行事多為社會民衆着想，常以一個歷史學者的立場參與一些社會問題的討論，發表自己的看法，本輯收錄的《論文官考試之宜嚴》、《國體問題學理上之研究》、《田賦征收實物問題》、《因整理土地推論到住的問題》、《中國文化診斷一說》、《續說》、《學制芻議》、《新生活鑑古》、《如何根治貪污》等篇，都是呂先生為謀求社會改革所寫而刊於當年各種報刊雜誌上的文章。《義州遊記》是呂先生所寫的惟一一篇遊記，一九二〇年先生利用國慶假期，偕同事遊朝鮮義州。是篇乃歷史學者之遊記，頗注意歷史沿革、中朝邊境的物產貿易以及風物人情，今日觀之，俱已成為歷史矣。《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是一篇論述近世學術變遷、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的長文章，文章雖是對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的評說，從中也可見呂先生的治學路徑和為人處事的宗旨。

“文學文獻文字”一組收輯文學、文史教學、文字學等長短文章二十四篇。其中《小說叢話》、《〈詩經〉與民歌》、《新舊文學之研究》、《論

基本國文》、《文學批評之標準》等篇，是先生存稿中為數不多的有關詩文、小說等文學領域的理論批評文章。《整理舊籍之方法》、《乙部舉要》、《怎樣讀中國歷史》、《中學歷史教學實際問題》、《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史學上的兩條大路》等，都是先生為指導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文史所寫的文章，有些原是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光華大學裏的演講稿。先生論治學方法，多切實可行，淺而不陋。如認為讀中國史書，當注意治亂興衰和典章經制兩大方面；讀正史，先當用功“四史”；讀先秦古書，不可不讀前人的注疏和校勘；又說“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學者當就自己的“閱歷所及，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正不必兢兢於故紙堆中討生活了”等，這些很具體的讀書方法，都是基於呂先生自己的治學經驗，實在是治學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呂先生對文字學素有研究，早年的代表作有《章句論》、《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和《說文解字文考》（後合為《文字學四種》，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本輯所收的三篇，均寫於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其中《論文字之改革》，是呂先生去世前數日才脫稿的最後一篇文章，原是《字例略說》的增補稿。文章對當年的文字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文字改革不能速，亦不能過恃政令之力”，更不可“紊亂其自然之規律，而造出苦難耶”。

“書信序跋自述”一組共收輯文章二十一篇。其中《致廖仲凱、朱執信論學書》寫成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刊於同年《建設雜誌》第二卷第六期），這是呂先生第一次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他第一次以歷史學家的立場，參與當時學界的關於井田制的學術討論。《三上光華大學行政會書》，分別寫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和一九四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光華大學的初建正值日本侵華戰爭的前夕，呂先生認為中國同日本的戰爭，祇是時間的遲早問題，而中國人也祇有打勝這一戰，才能立足於世界。因此學校的建設或社會的各項舉措，都應從這種實際情況出發。為此他兩次上書光華大學行政會，對學校的建設和改革，提出自己的見解。抗戰爆發之後，光華校舍“悉成煨燼”，學

校不得不停辦。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光華大學復校，校領導合議復校之策，呂先生又第三次上書光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具體地申述了他的復校計劃。第一、二封上校行政會書，曾刊於《光華大學周刊》和光華學生所辦刊物《小雅》上，為錢穆先生所激賞，譽為“西京賈晁之論”。本輯所收的《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全文約一萬五千字，是呂先生自述的傳記文字，雖是思想改造的總結，實是研究呂先生的思想演變、學術觀點和生平經歷的重要資料。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六年八月

目 錄

蒙古種族考	1
歷史上之民兵與募兵	9
非攻寢兵平議	20
《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	34
論荆軻	44
論李斯	47
論秦二世	50
論魏武帝	53
論沮渠牧犍之死	56
中國文化東南早於西北說	61
古史紀年考	68
四史中的穀價	80
漢人訾產雜論	88
秦漢移民論	120
從民族拓殖上看東北	131
歷史上之遷都與還都	136
南京爲什麼成爲六朝朱明的舊都	143
論度量——論宋武帝與陳武帝	148
東洋史上的西胡	163
古代人性論十家五派	168

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係	177
古代之印度與佛教	186
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190
西漢哲學思想	203
魏晉玄談	235
訂戴	243
道教起原雜考	249
論文官考試之宜嚴	259
國體問題學理上之研究	262
義州遊記	276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	282
考試論	292
來皖後兩點感想	309
論民族主義之實際	315
論南北民氣之強弱	321
思鄉原	328
倉儲與昏鈔倒換庫	330
田賦征收實物問題	335
改良鹽法芻議	340
中國民族精神發展之我見	343
蔡子民論	355
孤島青年何以報國	360
論祿米之制	365
論外蒙古問題	372
因整理土地推論到住的問題	379
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	392
中國文化診斷一說	407
中國文化診斷續說——教育界的彗星	417

學制芻議	426
學制芻議續篇	431
讀書與現實	440
讀書的方法	442
新生活鑒古	445
如何根治貪汙	450
梁啟超新評價	457
全國初等小學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統一國語議	460
小說叢話	469
新舊文學之研究	480
整理舊籍之方法	482
乙部舉要(一)	492
乙部舉要(二)	497
擬中等學校熟誦文及選讀書目	505
文質	523
怎樣讀中國歷史	524
文學批評之標準	533
反對推行手頭字提倡制定草書	536
叢書與類書	540
中學歷史教學實際問題	542
論基本國文	548
《古史家傳記文選》導言	565
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	577
史學上的兩條大路	585
魏晉“科斗文”原於蟲書考	590
國文教學貢疑	598
《詩經》與民歌	601
論文史	608

節注《說文》議	611
論大學國文系散文教學之法	614
論文字之改革	627
致廖仲愷朱執信論學書	641
讀《國語表解》後記	655
答程鷲于書	662
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	683
再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	689
評校《史通》序	693
謝俠遜《象棋秘訣》序	695
《新唐書選注》自序	697
紀念伍博純君月刊專號序	706
讀《崔東壁遺書》	708
陳志良《奄城訪古記》跋	712
陳登原《歷史之重演》叙	714
童書業《唐宋繪畫論叢》序	715
柳存仁《俞理初先生年譜》序	717
柳存仁《上古秦漢文學史》序	718
《古史辨》第七冊自序	723
童丕繩《春秋史》序	725
沈子玄《逸周書集釋》序	727
柳樹人《中韓文化》叙	731
致光華大學校務委員會書	733
方德修《東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序	737
馬先之《左氏纂讀》跋	738
自述	741

蒙古種族考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至忽必烈汗滅宋，先後僅七十年，聲威所加，歐亞二洲，無與抗顏行者。當時南北亞美利加尚未發見，非洲則在草昧榛狂之域，蒙古人之勢力，幾於混一歐亞，即幾於混一世界矣，此誠前古所未有也。然蒙古種族所自始，史籍闕焉不詳，一翻閱元史，直從太祖叙起，於先世事跡，一語不及，令人茫然不知蒙古部族之所由來，非特不及《北史》特列世紀之精詳，即較之《遼史》於契丹部族原始，尚於營衛志中加以考證者，亦覺疏密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是誠讀史者之一大缺憾也。

蒙古二字，自宋以前，史無聞焉。《秘史》爲元人自作之書，號稱最可信據，然亦但自稱其種族曰忙豁勒，而不詳其所由來。惟《松漠紀聞》云：「唐骨子，契丹事跡謂之蒙古國，即唐書所紀之蒙兀部，溯源爲最遠矣。」案《舊唐書》云：「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傍望建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洪文卿侍郎云：《唐書·地理志》：回鶻有延侄伽水，一曰特延勒泊，泊東北千餘里，有俱輪泊，泊之四面皆室韋。所謂北大山，必是大興安嶺，俱輪泊當即呼倫淖爾，爲黑龍江南源。《水道提綱》稱曰枯輪泊，此外湖泊，更無同音。又以唐時回鶻地望證之，故知是也。據此以考元之先世，在黑龍江南，即所謂望建河。唐後西南從克魯倫河幹

難河。蒙兀《新唐書》作蒙瓦。尤與《秘史》忙豁音類。蒙兀、忙豁二音，一斂一縱，《秘史》於忙豁字旁皆注“中”字，明宜斂音口中，不宜縱音口外。忙豁斂音，即蒙兀矣。元時西域人拉施特而哀丁奉敕修史，亦稱蒙兀勒，不稱蒙古勒，謂蒙兀人自言部族得名，由來已久，與《松漠紀聞》之說，不謀而合。至今波斯人仍稱蒙古爲蒙兀兒。明時波斯書稱天山以北曰蒙兀里斯單。嘗面詢波斯使臣，詳審語音，實非古字。《瀛環志畧》云：“明嘉靖間，撒馬兒罕別莫卧爾，攻取中印度立國，勢張甚。謂莫卧兒即蒙古，實即蒙兀兒。萃中外之見聞以相印證，其爲蒙兀而不當作蒙古明甚。”案侍郎此說，考證蒙古之即蒙兀室韋，可謂精確詳盡，且猶有一至堅之證據，室韋出於鮮卑，鮮卑與靺鞨同族，靺鞨即滿洲人之祖也。今滿蒙語言固多相同者。此又可爲蒙古出於室韋之確證矣。然獨何以解於蒙古人自著之書？案《元秘史》云：“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狼鹿生人，語近荒誕，然玩其語氣，既指其播遷之所自，復詳其莫居之山川，此豈指獸類語耶。及一翻蒙文《秘史》原本，乃知所謂蒼色狼者，當譯音曰孛兒帖赤那，所謂慘白色鹿者，當譯音曰豁埃馬闌勒，蓋皆人名非畜類也。北人以狼爲猛獸，故以名男，鹿性馴，故以名女，猶中國人之以虎爲名矣。其開卷數語，當譯云“自天而生之孛兒帖赤那，及其妻豁埃馬闌勒，渡騰吉思海，營於斡難河之源不而罕山”。則合矣。所謂自天而生者，猶中國古以天子爲感天而生也。明人之譯《秘史》，意在藉此考證蒙古語言，而不在於考其史事。別有考。故於人姓地名之旁，往往附釋其語意，傳寫者不察，遂誤以人名爲狼鹿耳。據此，則蒙古先世，當以孛兒帖赤那爲始祖，而其種族，實來自騰吉思海地方。所謂騰吉思海者，果何地乎？案《蒙古源流考》云：“土伯特智固木贊博汗，爲姦臣隆納木篡弑，其三子皆出亡。第三子布爾納齊諾，逃往恭博地方，即娶恭博地方之女。地方人衆，尊爲君長，生子必塔赤罕。”布爾納齊諾即孛

兒帖赤那，必塔赤罕亦即巴塔赤罕也。然則蒙古先世，爲吐蕃王室之裔，所謂騰吉思海子者，即今西藏拉薩西北之騰吉里池，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車臣土謝圖汗境上之布爾罕哈勒那都嶺。孛兒帖赤那蓋即吐蕃可汗之季子，因遭家國之變，自拉薩出奔，越騰吉里池而至今外蒙古地方者也。

夫蒙古先世出於吐蕃王室之說，據蒙古人所自述，章章如此，而其出於室韋分部之說，按之中國載籍，又確鑿如彼，果孰爲是而孰爲非耶。曰：皆是也。按蒙文《秘史》云：“巴塔赤罕生塔馬察，塔馬察生豁里察兒蔑兒干，豁里察兒蔑兒干生阿兀站孛羅，阿兀站孛羅生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也客爾敦，也客爾敦生搏鎖赤，搏鎖赤生合兒出，合兒出生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妻曰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即蒙古二字之正譯，已見前。忙豁勒真，猶言蒙古部人。豁阿，蒙古語美女之稱，忙豁勒真豁阿，猶言蒙古部之美女，蓋遊牧人種男統未立，得姓之由，多從女系，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始娶蒙古部女，故其子孫皆以蒙古爲姓，猶金始祖函普娶靺鞨完顏部女，而其子孫遂以完顏爲姓也。

此外漢人記錄，又有謂蒙古先世，出自韃靼者。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云：“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遠漢者曰生韃靼。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靼至忒没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并其名，號稱大蒙古國。”孟珙《蒙鞞備錄》云：“韃靼始起，地處契丹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歷代無聞。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案此二書，俱以爲韃靼有黑白二種。生熟乃近塞之稱，非種族之別，猶女真係遼籍者稱熟，不係遼籍者稱生也。《蒙鞞備錄》與黑白並列爲三種，誤。而成吉思汗則出於黑韃靼，特一以韃靼爲女真同族，一以爲沙陀別種，一則但言成吉思汗出於韃靼，而不更言蒙古，一似韃靼即蒙古，

一則謂蒙古別爲女真東北之一國，成吉思汗特并其名以自號，一若毫無血統上之關係者然，爲相異耳。果如《古今紀要》之說，則蒙古與韃靼渺不相涉，成吉思汗何緣忽以其名自號？況循覽《秘史》，紀載蒙古先世事跡甚詳，曾未有於成吉思汗一族之外，別有所謂蒙古國者，至嘉定四年乃并其名以自號之說乎，此其說之謬誤，殆無俟辨。案帖木真稱成吉思汗號事在宋開禧二年，黃氏蓋誤以稱汗爲改定國號而又誤後五年也。特所謂韃靼者，不特孟珙、黃震皆以爲蒙古所自出，即蒙古人亦恒以之自稱，《秘史》中所謂達達者是也。然則韃靼之與蒙古，亦必有種族上之關係可知矣。案《唐書》云，韃靼者，靺鞨別部之居陰山者也。李克用叛唐兵敗，奔其部。及討黃巢，乃將韃靼萬餘人南。又《蒙韃備錄》云：“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盡能記之。韃人逃遁漠北，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此韃人稍稍還本國云。”據此參稽，則韃靼之所由來，又可瞭然矣。韃靼者，本靺鞨別部，自唐中葉後，始徙居陰山者也。故孟珙云歷代無聞。其時西突厥別部沙陀，亦適以遭吐蕃之難，來居是土，因所處之地相近，二種人遂相親交，故李克用兵敗，得往依之，及討黃巢，且能用其人。夫二種族既相親交，則昏姻互通，遂生新種，所謂白韃靼也。其距塞較遠之韃靼，不與沙陀通昏媾者，則仍爲單純之血系，所謂黑韃靼也。生熟韃靼，史雖不言其孰爲黑白，然大抵近塞者多白，遠塞者多黑，此可推測而知矣。韃靼種人，本處漠南，無由與室韋分部之蒙兀相接，孟珙所謂韃人在本國時也。自金人下滅丁之令，歲歲出兵，向北剿殺，此種人遁逃奔走，不得安其居，乃有播遷漠北，與蒙兀相遇者。種族既同，聯結自易，故迄於金之季世，蒙古人復以達達自號也。蓋至此而蒙兀之與韃靼，亦已不復可分析矣。然則宋時之所謂蒙兀者尚非單純之室韋種人也。

又按《秘史》載元世系，始於孛兒帖赤那，而拉施特所作《蒙古